



BY YUNZHONG SHU

内线号手

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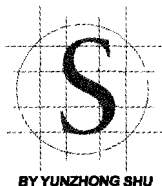
主编 季进 王尧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上海三联书店

学术文库



内线号手

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

主编 季进 王尧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舒允中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ISBN 978-7-5426-3206-7

I. ①内… II. ①舒… III. ①文学流派-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4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221 号

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

著 者 / 舒允中

责任编辑 / 戴 俊

特邀编辑 / 彭 伦 陶媛媛

装帧设计 / 王小阳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35 千字

印 张 / 7.25

ISBN 978-7-5426-3206-7

定价:25.00 元

编辑缘起

在我们酝酿“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早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宏大的认识中国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重新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有时又习惯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为叙述方便，我们统一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提法）的发生和研究，从来都与西方文化和学术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关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有非常成熟的论述，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话语的成熟与转型始终与这种影响不可分离。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西学”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而非虚假的问题。

一九八〇年代以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事实上开始了重建其“合法性”的过程。此过程无疑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的背景直接关联，同时，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作为异质因素，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和学术再生长机制的建立。这一历史场景，既是我们许多学者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个人经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集体记忆。“西学”的影响大致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思想、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如果回

溯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们应当还记得当时某本著作、某种观点、某种理论与方法，曾经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冲击甚至是震撼。如何看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也自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一部分内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处于一个常态的互动状态。曾经有过的食洋不化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态与行为，其弊端早已为学界识别，如同我们早已不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一样。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更从容、理性地对待“他山之石”。因为有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当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生态日趋正常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信与优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之一，处于“母体”中的我们无疑对中国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语言有着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这样一种优势和自信，自然也包含了接纳和扬弃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作为。在对待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我们曾经一方面强调研究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差异，无疑这种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和方法；而且事实上，即使在我们内部，意识形态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也始终没有消除过；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只是在一些方面改变而非取消我们的学术。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学术研究是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和中国比较成熟地对待西方这一个大背景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从容的文化心态和学术自主的能力。

悄然变化的不仅是我们的内部，整个文学研究的语境和海外中国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亦已发生变动。“对话”，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个陌生和忌讳的词，显见全球化对整个学术的影响之深之甚。因为“对话”的实现，思想、理论与方法的融通，是“中国”与“海外”打通的一个表征。在这个常识性的表述之外，我们还想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是“中国”和“海外”的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因此，其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和中国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在这样的视野中认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或许会重新思考“中国”与“海外”研究的关系及相互意义。我们还注意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队伍其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从这套丛书的原作者便可看出。他们当中，既有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也有以中国文化为母体、后来又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以后者而言，有些学者先在中国大陆完成大学教育而后再到海外问学。所以，这些学者对“中国问题”与语境不是那样的生疏和隔膜，而他们又在西方的学院中完成了学术训练，这样的双重影响也是我们考量其学术研究的一个背景。

近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再次提出，这是学界重新整合现代文学研究学理基础的必然。我们策划和主编的这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既是一个参照，也是重建现代文学研究“合法性”的一个部分。这套书也许是到目前为止译介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最大规模的工作之一。具体选目充分听取了海外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试图整体性地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从地域上讲，兼顾欧美；从作者来讲，兼顾老中青三代学者，又以青年学者为主；从选题来讲，兼顾纯粹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研究、

理论研究以及文学与电影研究，以此体现海外所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学”特有包容性与研究趋向。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目前的译介仍然是局部的。如果从区域的角度看，现在译介的著作还集中在欧美特别是美国学界，对非英语类的研究著作，比如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们了解得不多，这不能不算是本译丛的一个缺憾。即便是英文著作的译介，或者由于版权的问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还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才能译介。这些都有待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也期待学界朋友推荐选题和加入译介工作，从而使这套译丛更加丰富。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工作其实只是一个开端。

这套译丛从酝酿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值此丛书出版之际，我们首先要感谢夏志清教授、李欧梵教授、王德威教授和奚密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们慨然担任本译丛的顾问，并亲自参与书目的酝酿与遴选，推荐相关书目，保证了译丛选目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王德威教授还专门为译丛撰写了总序。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公司黄育海先生和上海三联书店戴俊先生，他们高瞻远瞩，不计成本，毅然接受了这套译丛；也要感谢彭伦先生，他在解决版权、掌控流程、编辑出版等方面，居功甚伟。感谢各位原作者和译者的大力配合，使得译丛得以高效高质地顺利出版。最后还要感谢查明建、张晓红等朋友的无私帮助，这套译丛成为我们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事业。

近日，李欧梵教授在苏州大学讲学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未开始。这个论断自然不是否定式的，更多的包含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期待。王德威先生为丛

书所作大序，也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信息。在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趋成熟的同时，学术的再度转型之势也逐渐呈现。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学术转型带来积极的因素，为中国与海外的研究整合提供创造的机会。

季 进 王 尧

二〇〇七年六月 苏州

目 录

编辑缘起 季进 王尧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 王德威

中译本自序 1

导 言 现代中国文学活动张力试论 1

第一章 从“五四”青年到鲁迅盟友：胡风的精神历程 24

第二章 战时英雄主义的药石：早期《七月》报告文学 45

第三章 从反映到抒情：《七月》报告文学与《七月》

小说之间的过渡 69

第四章 树立形象，阐述遗产及确立方向：胡风对

“五四”、鲁迅及“主观战斗精神”的诠释 92

第五章 不同形式的精神介入：路翎的短篇小说 112

第六章 自我超越的种种表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 137

第七章 历史细节的表现与再现：冀访的《走夜路的人们》 164

尾 声 187

参考书目 193

鸣 谢 205

导 言

现代中国文学活动张力试论

当一九三七年的芦沟桥事变将抗日战争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的时候,中国文学像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一个紧要关头。在民族生存成为全国当务之急的情况下,那些遵循“五四”文化批判传统的作家在新形势中迫切地感到他们应该转变自己的写作方向。许多作家弃绝了受到西方影响的白话小说模式并开始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呼唤大众投入战争,有些作家甚至主张作家应该投笔从戎直接报效祖国。在那些仍然以白话为媒介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对民族英雄主义的赞扬充满了报告文学这一由于其时事性而风行一时的文学式样。面临着全民对战争的普遍关注和拯救祖国的迫切任务,中国文学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向心”倾向。^①

然而那种认为中国文学在形势紧迫的战争早期只表现出“向心”倾向的看法却没有完全反映历史的真相。首先来说,不同阵营的作家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各自的政治倾向,因此各阵营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左派阵营中,以批评家胡风为首并以其编辑的《七月》杂志为论坛的一群作家不断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爱国主义信条进行有力的挑战。七月派的方向首先来自鲁迅在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战中所坚持的民族文化批判立场的影响,

^① 参见洪长太的《战争与通俗文化》一书中描述中国文化工作者用话剧、漫画、新闻报道以及民间文学进行抗日宣传的有关章节。

此后七月派作家坚定不移地反抗他们所认为的“抗战八股”对文坛的统治。在这些作家对左翼文学主流进行不断挑战的过程中，他们在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诗歌、小说，甚至散文等领域中丰富了战时文学。尽管这一流派最终消亡于对“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中、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受到中国官方文学史的完全忽视，但其生存方式仍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种生存方式有助于我们克服那种将战时文学看成单一文学的看法。出于这一目的，本书将描述七月派在其历史环境中的起源和发展，并分析其重要成员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

在我开始讨论七月派之前，我首先要声明，我无意强调这一流派在战时文学中的典型意义。事实上典型性恰恰是我在受到七月派作家启发下所要加以质疑的观点。就算战时文坛的确存在，其间也有种种地域/政治区别。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国统区、日占区（如东北，华北和上海）以及共产党统治区域的文学活动均有所增长，而每一个区域中都有目标不同、不相融洽的作家存在。由于这些区域中的文学环境和各种倾向彼此相差悬殊，任何企图将战时文学活动提炼成一种共同模式的做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七月派作家与生存于国统区之外的作家之间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发现这些作家的共同关心之处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项目，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无法讨论这一问题。

同时我还要声明，我无意宣称我能回答所有有关七月派作家及其作品的问题或解决这一流派的疑难之处。为了理解这一在不同程度上牵涉到近一百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并存在了十几年的流派，我不得不作出一些选择，因此本书显示了一定的架构。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从事研究时弃绝任何架构，因为所有的文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架构。

相反，我们应该对下列问题加以关注：我们的架构是否成功地突出了研究对象的特点？我们的架构是否反映了历史真实？我们的架构与其他研究同一对象的架构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具体来说，我充分意识到胡风和他的同伴们在得到正式平反后在当代中国大陆重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大量出版的原始资料（如再版的原著、新出版的日记、书信等等）和一些参考资料（如传记、回忆录等等）对我的观点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那些数量众多的有关七月派的学术论著而言，我发现这些具有可嘉之处的论著从总体上来说回避了与七月派有关的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然而也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作为一个无须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政治后果担心的学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填补这一甚至西方学者迄今尚未填补的空白。出于这一目的，我决定主要研究七月派作家所运用的某些文学体裁和七个七月派作家，因为这些体裁和作家在我看来最集中地体现了七月派的方向和这一流派所要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博或定论，而在于发掘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被长期忽略的一种声音以及这种声音所作的自我超越的努力。

七月派的形成

为了了解七月派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应该着手于理解这一流派的历史环境。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当时的文化界并非一个不能容忍任何异议的一统天下。国民党是一个高压政权，但这一政权实际上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随后产生的是一个有限容忍自由组织和私人出版物的民间社会。战争期间的出版物当然是受到国民党政府审查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构远在陕北偏远之地，其政治力量不足以号令

那些生存在国统区的左翼作家，更不用说那些生存在国统区的其他政治阵营中的作家了。作为一个以国统区为主要阵地的异议集团，七月派可说是生存于这种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文化界控制不完全而产生的缝隙之中。

相对于国民党和倾向于国民党的作家来说，共产党和受其影响的左翼主流作家无疑对七月派的创作有重大关联。七月派的文学活动在不同时期对左翼文学主流作出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流派的方向是由其敌对面决定的。然而共产党和当时的左翼文学主流并非铁板一块，也没有周详的文化计划。事实上胡风在战争期间数次得到共产党副主席及其派驻重庆的主要代表周恩来的帮助，其中包括从周恩来那里为《希望》杂志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保证金。由于共产党在国统区没有始终如一的文化政策（这种政策即使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也要等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做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得以定型）以及左翼阵营在战争期间由于和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关系而产生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说七月派作家那种将左翼主流看成铁板一块的看法是想象的产物而不是实际的反映。为了确立自己的挑战者地位和方向，七月派作家有必要设想这样的一种统一中心。

七月派生存在这种政治势力没有完全控制文化界的环境中，因此得以用自以为恰当的方式看待一些重要问题。尽管这一流派的具体成员无法决定文学界在不同时期中产生的不同关注焦点，他们却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以及增强自己立场的策略。这些以斗争为宗旨的作家在全力以赴地向左翼文化主流进行挑战的同时基本上忽略了左翼以外的文化界，而这种情况在战争晚期文学界进一步显示出多样化倾向时变得尤其突出。这些作家所写出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都充满了反抗精神，可视为这些作家与当时左翼文学主流争

夺影响和合法性的具体表现。

七月派是怎样获得这种以左翼文学主流为敌手的持续不断的挑战倾向的呢？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下列有关文学或艺术生产的观点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文学界或艺术界是一种充满了各种势力的区域，同时也充满了旨在保存或改变现状的斗争。在这种区域里，处于不同地位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客观关系决定了这些参与者用来维护或改善自己地位的策略，而这些策略的力量和形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地位。^①

然而布尔迪厄这种从经济学出发的观点只能帮助我们从某种程度上理解七月派。布尔迪厄认为一旦文学领域里的某个受压制的流派取得显赫地位以后这个流派就会由于各成员之间的受益不均而产生内部竞争从而导致流派的解体。^②这种从法国文学出发的观点显然不适用于无论在取得地位之前或之后都相当团结的七月派。七月派的凝聚力来自其成员的共同政治信念，这种凝聚力表明七月派并不只是为了争夺实际上或象征性的权利和地位而生存。在我看来，布尔迪厄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文学领域内各种参与者之间的竞争而忽视了参与者对自己的反省。我们会看到七月派作家，尤其是路翎和冀汭，在向左翼文学主流挑战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质疑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因此他们作品中呈现出的力量关系与布尔迪厄著作中所显示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坛的力量关系大不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生产领域：颠倒的经济领域”，《文化生产领域：艺术和文学论文集》，页30。

②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规则》，页267。

相同。

在七月派面临的历史环境中，文学或艺术问题往往远远没有当代的政治或文化问题那么重要，这是这一历史环境和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之间最关键的差别。这些政治文化问题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作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不得不公开表态，与此同时，他们还对自已的正确性和论敌的错误性加以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判断。然而，某些集团的地位上升并不意味着其敌手一定会在文坛上消失。相反，这种地位上升会使处于弱势的对手产生一种危机感并促使对手加倍努力地阐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正如七月派作家为了捍卫“五四”传统而反抗他们所认为的浅薄爱国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所显示的那样。因此某些长远文化项目，诸如文化批判等等，能够在不利的情况下得以生存甚至发展，七月派报告文学能够继续揭露中国的内部弊病就是一例。七月派作家对“五四”传统的坚持也许就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定势”^①。在这种“定势”的指导下，七月派作家得以在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道路。同时，这一流派的组织形式也决定了其坚定恒长的倾向。在这一方面七月派和中国新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的近著表明“文学研究会”在其章程的指导下形成了一个相当民主的组织，其成员的吸收和丛书的编辑都通过选举形式加以决定。^②相反，七月派仅受胡风一人影响，尤其是在胡风几乎控制了所有的七月派出版物的早期阶段。胡风的地位使得他能够轻易地

① 布尔迪厄将“定势”解释成一种有持久性及可转移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旦在实践中被获得并变成习惯后会使人无意识地用它来指导规范自己的行为。参见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页72—95。

② 见米歇尔·霍克斯的“文学研究会(1920—1947)与民国初期的文学界”，《中国季刊》，第153期(1998年3月)，页54—55。

排斥那些和他有重大分歧的作家。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来自七月派对立面的压力，无论是真实的压力还是想象的压力，也坚定了七月派的立场并促进了这一流派的内部团结。

七月派的情绪倾向在这一流派的生存过程中也起了重大作用。胡风素来好辩，三十年代在他成为左翼文坛权力角逐者之一后，他对当时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代表周扬的敌意往往决定了他的立场。他们之间的不断辩论既产生于意见分歧，也产生于两者之间的不睦，搀和了思想成分和情绪成分。这种对立最终表现在有关“两个口号”的辩论中，而胡风在这一辩论中所持的立场则决定了七月派的基本方向。除了周扬及其同伴之外，胡风的对头还包括茅盾和郭沫若，这是因为茅盾曾经在一九三五年为了使鲁迅疏远胡风而向鲁迅散布过胡风是国民党间谍的谣言，而郭沫若一方面曾经大力提倡“国防文学”，另一方面又于一九三八年被共产党塑造成鲁迅的继承人和全国的左翼文化领袖。茅盾和郭沫若分别代表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成为七月派作家此后在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指导下不断加以攻击的两个主要目标。^①受到这种情绪影响的同时，表现出这种情绪的七月派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说是用文学的方式体现了七月派作家对敌手们的敌意。

胡风在七月派的形成和生存过程中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大致了解一下他的思想形成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七月派。作为一个在“五四”期间成长起来的充满浪漫情绪的理想青年，胡风如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在他的成长期内对中国的所谓封建传统采取了一种批判态度。这种早期形成的彻底反传统的态度此后自然而然地决定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促使他无论在思想上、情绪上还

① 我在一九九五年六月对舒芜的采访中从舒芜处得到这种说法。

是在行为上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倍加挑剔。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讨论各代人不同的成长定型方式时曾指出，每一代人都倾向于用自己的早期印象来诠释后来的经历，无论这些后来的经历是进一步证实了早期印象还是否定了这些印象。^①就胡风而言，他的后来经历只是不断地增强了他的早期印象，使得这种印象成为牢不可破的信念。

胡风于二十年代晚期至三十年代早期参加了日本的普罗文学运动，因而受到福本主义的影响。福本主义强调真正的革命者有必要将自己和同路人加以严格区别，同时也强调理论斗争的重要性，在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内很有声势。福本主义的影响最终导致胡风执着于强调革命阵营内部，尤其是七月派内部的纯洁性以及他为了维护理论的纯洁性而进行的不断辩论，而这种对纯洁性强调的同时也掺杂着宗派主义成分。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中国左翼文学界中受到福本主义影响的绝非胡风一人。在此之前，创造社和太阳社于一九二八年就革命文学而进行的论战以及这两派作家对鲁迅进行的联合攻击就表明了这种影响。^②福本主义的影响促使中国革命文学从一开始起就充满了内部竞争，从这一角度来说，胡风的论战实践不过是这种内部竞争的一个具体例子。

一九三三年胡风进入上海左翼文坛后所一心坚持的反封建文化传统的立场以及他进行的一系列论战，当然与他青年时代所受的“五四”影响以及后来他作为一个左翼批评家所受到的福本主义的影响有关，然而这种立场与他在文坛上的位置也有重要关系。作

① 见卡尔·曼海姆，“论代与代之间的区别”，《知识社会学论文集》，页298。

② 参见王宏志所著的《上海的政治和文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1936》，页19—28。